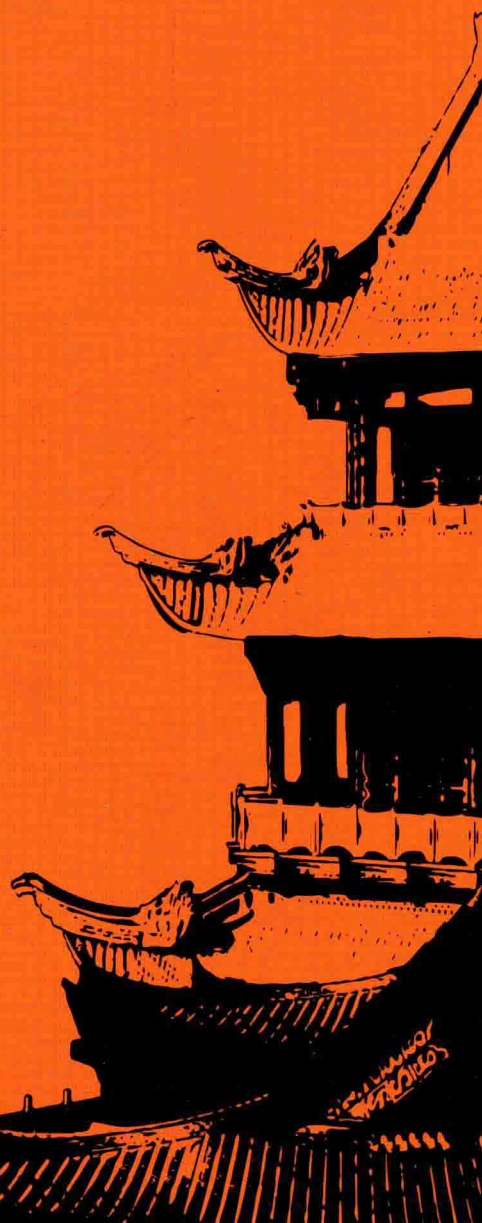




本书系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宋书》文学研究」(11YJC751040)最终成果

《宋书》文学研究

李翰 著



上海大学

本书系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

“《宋书》文学研究”(11YJC751040)最终成果

《宋书》文学研究

李 翰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 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书》文学研究/李翰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671-2886-6

I. ①宋… II. ①李… III. ①《宋书》—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2800 号

责任编辑 焦贵萍

助理编辑 时英英

封面设计 缪炎栩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宋书》文学研究

李翰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73 千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2886-6/I·460 定价 68.00 元

序

李翰《〈宋书〉文学研究》将付梓，索序于予。予览其书稿，虽阅不甚细，但初觉有三点颇受启发，值得称道。

一曰论史学与文学之关系有所发明。

李翰以咏史诗研究获博士学位，对文史关系向有关注。近年与予同做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课题，其相关著述及与我交谈中亦屡涉文史关系问题，故知其对此思考颇深。此番研究之沈约《宋书》，既属二十四史之一，文史关系自然更是首先要遇到的大问题。李翰在论述中，藉对史之“诗心”的辨析，明确提出所谓历史叙事，实含事实与事义两个层面。事实见于文字，强调的是直笔和实录，由此保证了著述的史性。事义则渗透、潜藏于全部的叙述之中，表现细腻幽微，实与中国史述向来重视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有关，须经读者作整体、贯通的考察方能有所悟解领略。从叙事学角度言之，事义的深隐和复杂乃是叙述主体干预在起作用的结果；从历史与文学、叙事与抒情的分野言之，则事义的存在，正是史述具有文学性和抒情性的依据。李翰遂曰：“所谓史家之诗心，当指历史叙事的文学性，但这不过是后人的阅读感受，其实史家并没有诗心，以《左传》而言，它不过是想把其史观、史识更好地通过史事表现出来罢了，即更自觉地将事义与事实融合所采取的叙述策略。说到底，还是史心而非诗心。今人从各方面来研究《左传》文学性的成果非常多，《左传》也确实具有文学价值，但这都是‘史心’结出来的‘诗果’，而‘史心’在历史的文本中就是‘事义’”。此一宏论及“事义”“诗果”之类概念的创设，颇具新意，引人深思，大有继续挖掘阐发之必要。

二曰对史述之叙事分析有所深入。

对《宋书》进行文学研究，自不能不涉及叙事问题。盖叙事为文史著述所必



有,而在文史领域中又各有侧重,有异有同,此正是对史书作文学研究的重要题目。为揭示沈约史笔之特色,论证史家诗心与事义之关系,李翰对《宋书》纪传之互见、补叙、插叙、倒叙、回叙、隐笔等均作了较详细的例示和分析,并且将前人已论及的“带叙”与《宋书》的家传附传现象特列一节予以专论,而在论述中既引述中国古今学者的见解,以为厚实基础,亦努力借用西方叙事学关于“叙述主体”“受述者”等概念,以谋中西贯通。其论说虽尚未达圆通之境,此种探索精神却很可取。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自然应该立足本土文学经验,重视中国自身的相关理论,明白中西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种种差别,但对域外行之有效的学术(如叙事学)亦不能不关心不学习。理想的境界可能应该是以本土文学经验为基本依据,学习世界有益于我之经验与理论,努力消化吸收,进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我们的研究参与到人类文化的创造和建设中去。李翰于此肯下功夫,《宋书》文学研究显示他既能立足本土,又愿开阔视野而绝不固步自封。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当代研究者,这是非常必要的。

三曰文字骏爽,语有风采,虽是学术著作,却有较强可读性。

古代文学研究文章,要在观点明晰,资料翔实,论证充分,一般并不要求文采,故即使质木无文似亦不妨。之所以如此,其关键在于作者往往追求心态冷静,力图完全置身所论之事外,笔下极少流露感情,久之,则往往连表达感情的欲望和能力也不免退化。李翰能诗能文,常有文艺性作品刊于报端或新媒体,抒泄情感,发挥议论,敞现心灵世界之一角。而此次在研究著述中也能放笔畅书,虽仍不免有所约束,但已表现出一种可见性情的骏爽之气。在我看来,也可以说,李翰是以其写作行为证实了叙事与抒情从来不可分裂割断、如能自觉融合则更能相得益彰的观点。其实,无论诗文,亦无论何种体裁的文章,若要深刻动人,亦非将两大传统交融结合不可。李翰作文能思虑及此,并尝试二者的结合,说明他已具备某种自觉,再加修炼,当臻成熟自由之境,待人书(文)俱老,则卓然自成一家矣。企予望之! 企予望之!

以上所述,不知李翰以为然否? 亦不知可以充是书之序否?

董乃斌

2017年6月30日于上海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宋书》撰成考述	11
第一节 沈约前后的行世宋史	11
第二节 沈约《宋书》成书述略	15
第三节 《宋书》版本及存佚情况	21
第二章 《宋书》文章	24
第一节 南朝前著史实践与史学发展	24
第二节 史体本位与辞章意识	30
第三节 《宋书》文章的辩证美学	39
第三章 《宋书》叙事	49
第一节 史著与叙事	49
第二节 《宋书》的“事实”与“事义”	57
第三节 《宋书》的“互见”与“回贯”	62
第四节 《宋书》的“带叙”与家传	73
第五节 《宋书》的小说笔法及意味	81



第四章 《宋书》载文	99
第一节 《宋书》载文概述	100
第二节 《宋书》载文的文献价值	113
第三节 《宋书》载文与写人叙事	119
第五章 《宋书》中的刘宋文坛	182
第一节 《宋书》中的刘宋作家	182
第二节 《宋书》中的文学交往：皇室与宗亲	192
第三节 《宋书》中的文学交往：文士及臣僚	205
第四节 《宋书》文学交往与刘宋文学	216
第六章 《宋书》文人述略	224
第一节 皇族文人：刘义恭与刘骏叔侄	224
第二节 朝士文人：从傅亮到袁粲	238
第三节 名士文人：从高门到山林隐逸	250
结语	259
主要参考文献	263

绪 论

一、选题缘起及以往研究略述

“文学”是近代经日本翻译而引入中国的概念，即英文“literature”^①，而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义涵要宽泛得多。在今人看来，《宋书》为典型史著，与“文学”有着诸多本质差异，讨论《宋书》文学，至多不过是讨论其文学性因素而已。而古人则多将“文学”看成文章之学，包括文章写作、文章功用、文章审美，等等。此所谓“文章”，则无论“文学”与“非文学”。故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中，文、史、哲在文章这一层面，并无分别，即便以今日“文学”概念来看，古代文、史、哲类文章，兼为文学作品的，也所在多有。因此，《宋书》文学研究，既符合文学史发展实际，也可拓展文学研究视野及格局。

廿二四正史中，前四史研究最火，《史记》《汉书》研究，更是源远流长，名家辈出。刘知几《史通》内篇卷七《鉴识》云：“《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②刘氏概而论之，乃唐前情形。唐后，宋人倪思有《班马异同》，元人王恽有《迁固纪传不同说》，清人撰述更多，如徐乾学《班马异同辨》、蒋中和《班马异同议》、浦起龙《班马异同》、周中孚《补班马异同》、沈德潜《史汉异同得失辨》、熊士鹏《班马异同论》、汪之昌《马班异同得失考》等；民国以来，则有姚尹忠《史汉论略》、陈柱尊《马班异同论》、黄子亭《史汉异同》、郑鹤声《史汉研究》、陈衍《史汉研究法》、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

^① 鲁迅《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考述“文学”出处，辨析其古今不同的用意，可参。文收于《且介亭杂文》，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刘知几《史通·鉴识》，见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第1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施丁《马班异同三论》，等等。^① 上述大多为历史研究，但涉及著述的章法、结构、风格、语言，对《史》《汉》的文学价值也多有发明。

对于古代散文大家，《史》《汉》则是文章典范。韩愈《进学解》即将庄骚与太史等并称，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自称其文“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都是耳熟能详的例证。古文家将史著与文学作品放在一起讨论，视之为古文的重要渊源。而史著也确实催生并影响着散文的写作，它们孕育并滋生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半壁江山，进而影响到近古小说、传奇的发展演化，其于文学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胡应麟《史书占毕》云：“班马之书，晋隋以前，习其义者，不啻百家，而于词忽焉；唐宋以后，习其词者亦且百家，而于义疏焉。故史汉之学盛于六代之前，而其文贵于六代之后，盖至明而极矣。”^②可见，愈到后代，《史》《汉》作为文章的价值，愈加凸显，也愈被文学史家所看重，这在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研究，郭预衡的散文史研究，袁行霈、章培恒等的文学史研究中，都有体现。甚而因之形成专门的史传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如聂石樵《司马迁论稿》（中华书局，2010），围绕《史记》阐述司马迁在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贡献，对其文学性尤为侧重；张新科《〈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12年第5期）梳理了《史记》成为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并从文学史的角度，指出其作为文学经典的意义；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一者以《史记》为核心，论述司马迁的传记文学成就，一者则对《史记》总体上的文学成就作了细致探绎。研究《汉书》的成果也很多，如陈梓权《〈汉书〉的文学价值》（《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潘啸龙《简论班固和他的〈汉书〉》（潘氏著《楚汉文学纵论》，黄山书社，1993），等等。

相比较而言，同为廿二四正史，《宋书》的文学研究似乎略显冷清，但留心搜辑，就知道古人其实并未忽略《宋书》的文学价值。《文选》收录《谢灵运传论》《恩倖传论》，可说明《宋书》文学价值差不多在沈约同时即已受到重视；赵翼《廿二史札记》揭示《宋书》“带叙”法，谓其为作史良法；郝懿行辑《宋琐语》，致意于

① 参汪荣祖《史传说统·班固第九·附说·班马异同说》，第9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乙部》卷十三《史书占毕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宋书》“华赡清妍，纤秾有体”，对其文学性颇有发明。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从史学的角度考证或评论《宋书》批评，对我们的《宋书》文学研究也很有助益。如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有《〈宋书〉札记》，对《宋书》文本的考订、校释，就涉及其中的文学文本或文学家，是《宋书》文学研究重要的参考。也有学者从史学角度批评《宋书》的著述之失，然往往却能从反面说明了《宋书》的文学价值。如胡应麟谓“读沈约、魏收诸史，而知李延寿之史之得也，其浮词简也”^①，所谓“浮词”，刘知几《史通》专立一节讨论，其言有曰：“夫人枢机之发，亹亹不穷，必有徐音足句，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盖，发虞之端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而史之叙事，有时类此。”刘氏以此为类比，阐述史著在记叙正事之外，往往前后加以铺垫，或补充细节，以为“论事之助”。^②但如果失度，“轻事尘点，曲加粉饰”，就会导致芜累。这种芜累，其实正是使用了文学笔法的结果。赵翼也有类似看法，他在赞许《宋书》“带叙法”时，也指出个别篇目附传超过本传，不免“喧客夺主”。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宋书》因浓厚的叙事兴趣，而忽略其于史体是否适当。类似浮词之累，于史有失，但在某种情形下，于文却未必是失。

晚近学界于正史文学研究，多集中于《史》《汉》等数部经典，前面所列举的今人著述，都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个别学者的研究范围有所拓展，会在系统考察中古以前的史著中涉及《宋书》。如李少雍《从古史及“四史”看史传文学的发展》（《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指出在刘知几以前存在“文胜质则史”这一观念，影响到唐前史学著述，史著因重视文辞而具备文学色彩，也与此一观念有关，从创作思想上对史传具备文学性的成因作了探讨。该文主要还是以前四史为主，但在讨论史传文学的发展时，对《宋书》《南齐书》《魏书》等南北朝史著也作了综合考察。李少雍又有《略论六朝正史的文学特色》（《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主要讨论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其中有不少篇幅论及《宋书》小说家言、叙事艺术、序论辞藻。张亚军是专攻南朝史著文学研究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集记载》（《齐齐哈尔

①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乙部》卷十三《史书占毕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② 刘知几《史通·浮词》，见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尔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论南朝“四史”史臣的文学观》(《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学定位》(《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8期)、《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学赏会》(《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南朝史传之人物艺能胪录》(《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南朝史传人物外貌描写述论》(《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论南朝史书史传人物的诗歌选录》(《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南朝四史史论之抒情与理性特征胪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论南朝四史史论之骈俪色彩》(《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宋书》是南朝史著中较重要的一种,在张氏的系列论文中,皆有涉及。

专论《宋书》或沈约的,以《宋书·谢灵运传论》研究最为充分。从王国维《五声说》、刘大白《关于“八病”的诸说》、陈寅恪《四声三问》、郭绍虞《永明声律说》《再论永明声律说》《蜂腰鹤膝解》等论文始,《谢灵运传论》就成为讨论中古声律理论的重要资料,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后来在几部著名的文学批评史,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著作中,均充分肯定了该篇在文学批评史中的地位。

在后续的文学批评史中,如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通史》,这一认识继续得到深化。该著引《谢灵运传论》末尾所论声律文字,作详细释读,并引沈约多篇文章、书信,详论沈氏声律论的文学主张。除声律论之外,该著还着重讨论了《谢灵运传论》对历代文学的论述,认为较以前就某一种文体论文学发展,《谢灵运传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先秦至近代的文学发展,有如一篇简括的文学史。沈约力求概括出某一时代文学创作的概貌,指出其时代风格,其后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就承袭了沈约的做法,《文心雕龙》和《诗品》也受到其影响。这是将《宋书·谢灵运传论》放在六朝前后的文学史学术史中,清晰地论述了其学术地位。^①陈庆元《沈约文学批评六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在《谢灵运传论》之外,还关注到《鲍照传》,同时结合沈约的阮籍诗注及其他文献所载沈约论诗文的言论,由《谢灵运传论》的声律论扩展到对沈约整体文学思想的探讨,取材于《宋书》的资料也大大扩展,开拓了《宋书》文学研究的

^① 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通史》第二编第二章《沈约和声律论的形成》《沈约论历代文学》诸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226页,第247—251页。

疆域。钱志熙《〈谢灵运传论〉与永明文学革新——兼论沈约的文学发展道路》（《求索》1993年第2期），从《宋书》的体制出发，认为《谢灵运传论》的文学史论是从《宋书》整个体例中派生出来的，《宋书》在文学中选择最重要的作家谢灵运，附以论赞来表达其文学思想，在儒学中选择臧涛、徐广、傅隆，附序论来表达其儒学思想，其体例是一贯的。《宋书》对于文化学术的重视，既是时代风气，也是著史体例中必须突出的重要问题。钱文还细致描述了沈约由史学转向文学的发展道路，对沈约及《宋书》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有较深入的揭示。

上述对《谢灵运传论》的研究，都较为系统深入，有些论著还扩大到《宋书》中的其他篇目，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宋书》的文学价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仅此一篇传论及个别文人传记，尚不足以穷尽《宋书》的文学资源。在《谢灵运传论》之外，有不少学者也已注意到《宋书》其他部分的文学特色。刘师培早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对《宋书》的文学特色就有极高的评价，其言曰：“六朝文之传于今者，以沈休文为最多，而《宋书》实其大宗也。《宋书》为《三国志》以下最古之史，叙事论断，并有可观。其纪传叙论亦能夹叙夹议，各有警策。蔚宗而后，此实称最。”^①刘氏高度肯定《宋书》的叙事艺术及其议论，认为差可与《后汉书》同列。今人则有专力于《宋书》文学研究的学者，如鲁云华《论〈宋书〉的写人艺术》（《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论〈宋书〉的叙事艺术》（《宿州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就是以整部《宋书》为对象，考察其在写人、叙事方面的文学性。鲁云华以《宋书》为观察点，还有《从〈宋书〉观照刘宋文学理论批评》（《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论〈宋书〉的文学史料价值》（《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等，有意识地系统考究《宋书》文学性征，难能可贵，然对其在史著文学史上的渊源影响较少发明。他如郝润华《六朝史籍与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版）、林家骊《沈约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或是着重于史学，或是偏向于沈约的文章创作，虽也论及《宋书》的文学性或文学思想，皆较零散。

值得一提的是《宋书》的语词研究。郝懿行《晋宋书故》考释《宋书》语词，对于了解中古的语言与文化，具有重要价值。郝氏的考释多是从训诂与文献的角

^①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之《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度,而当代学者则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于《宋书》的语词特征作了深入系统的揭示。如万久富《〈宋书〉复音词研究》(凤凰出版社,2006版)、宋闻兵《〈宋书〉词语研究》(中华书局,2009版)等,尤其宋著,不但重视复音词研究,且细考《宋书》各类新词及评赞类用词特征。《宋书》是上古汉语走向中古汉语的绝佳语料标本,但这种语词转向于文学之意义,却有待进一步探索。

由上述可见,学界虽对《宋书》文学成就不乏思考,对其中部分篇章,甚至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热潮,但全面研究依然欠缺。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承刘师培之论,云:“沈约文数量之多,冠于南朝,但大多是诏告碑传和关于佛理的论文,文采远不如诗歌。他的骈文、散文成就,反倒在史学著作《宋书》里表现得比较清楚。”^①其言洵然,却仍有未及。《宋书》既是文学文本,又是文学史料,富含文学史、批评史、文学理论诸多资源,所谓全面研究,即在文学史坐标下,对《宋书》文学资源的综合开发。

二、本书研究旨趣及内容概述

如前所述,古今关于“文学”的意涵多有出入,本书《宋书》文学研究,固然要揭示其符合现代“文学”意义上的审美品格,同时更要从当时人的文学观来看其“文学”价值,并以之为基础,将《宋书》放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历史中,考察其位置与价值。

在今人看来,《宋书》为典型史著,与“文学”有着诸多本质差异,讨论《宋书》文学,至多不过是讨论其文学性因素而已。而古人则多将“文学”看成文章之学,包括文章写作、文章功用、文章审美等。此所谓“文章”,则无论“文学”与“非文学”。故《宋书》文学研究,在中古“文学”概念中,即是《宋书》文章研究;在现代的“文学”概念中,是对其文章中与现代“文学”相关之因素的研究,这种相关因素,一是其文章中的“文学性”,二是其与现代“文学”相关的文献资源,通过这些文献,可了解当时文学活动、文坛情状,了解著者及当时的文学思想,等等。综合起来看,《宋书》文学研究包括《宋书》文本研究与《宋书》文学文献研究两大项。

先说《宋书》文本。作为廿二四正史之一,《宋书》本质上是纪传体史学著

^①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述。经过两汉魏晋至《宋书》撰成的齐永明年间,中国史著修撰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成果,史著体制逐渐规范,官修正史,更是趋于稳定的模式。刘知几《史通·六家》归纳史书体例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家,班固《汉书》大约完成于东汉章帝建初中,则中国史书体制至迟在公元80年左右,即告完备。《汉书》体制其实本自《史记》,二者区别仅在一为断代,一为通代,兹后正史即为《史》《汉》规制。《史通·二体》又论史著有“编年”“纪传”二体,《史记》为纪传之祖,刘知几云:“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①可见,正史著述早在司马迁著《史记》,即已大致定型。

“纪传”,是正史的通行体式,在史著中篇幅最多。此外,尚有书、表等类。《史通·二体》论此形制有云:“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②。这些在《宋书》之前,皆已完备。《宋书》作为官修正史,是在南朝浓厚的修史风气中产生的,这一修史风气又与偏重文辞的文章写作风气处于同一时期,其最后集成者沈约,又是辞章大家、文坛领袖。这样两种风气的叠加、摩荡,使得《宋书》一方面受到史体的影响,篇目体式及行文结构都比较规范,有明确的史体意识;但另一方面,在语言及词语上,注重雅致精练、整齐和谐,又有明确的辞章意识。清人郝懿行《晋宋书故》谓《宋书》“叙致华妍,韵情朗畅”,即其文章之美,而这一审美特性,是具有文学性的。此外,《宋书》史材择取范围也比较广,奇事异闻,时有所载。如《刘穆之传》载刘穆之孙刘邕“嗜食疮痂”的奇闻,即为刘知几所批评,以为此类记载“殊失国史之体”(《史通·书事》),但若是从文学的角度看,却是以精彩情节塑造人物的小说笔法。可见,《宋书》大多能做到史、文并重,其间未免与史体有乖者,恰其与文学之有合者。

因此,《宋书》文本研究,首先是其文章研究,包括史体文章与文学文章。古人往往文、史不分,文学文章也多在文、史互渗互融中不断演进。但就散文而言,史对文的影响更大。韩愈《进学解》云“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

^① 刘知几《史通·二体》,见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② 刘知几《史通·二体》,见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所述大半竟是史著。廿四正史中,以《史记》《汉书》为渊源,形成文章写作的两大流派,尚古文者尊《史》,尚骈文者尊《汉》,各有家法师承。文学史中散文这半壁江山,是与史著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史著本身也就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书》是南朝史学的代表性成果,尽管其对文学史影响不及《史》《汉》,但其文字整饬近《汉》,叙事丰华又近《史》,亦自有可观。清人章学诚云:“虽不敢希踪班、马,而文辞典雅,颇具别裁,抑亦范氏之亚匹也。”^①将其与范曄《后汉书》相匹,评价较为中肯。沈约在《上宋书表》中自云“远愧南、董,近谢迁、固”^②,实际上正反映了其继承前史、追求新创的著述理想,从而在《史》《汉》之间形成自己“叙致华妍,韵情朗畅”的特色。

《宋书》文章研究,就包括文章的辞章组成与文章的记人叙事功能两大部分,要能揭示其辞章之美与叙事之精,并能在文学史的流程中考察其价值与意义。具体而言,主要内容有四:一是文辞。沈约曾提出“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的作文原则,而《宋书》文畅韵谐,正可作为一个考察的标本。《宋书》也讲究辞藻富美,师范《五经》,规模《三史》,这是在炫耀文采,还是在追求书面语言的客观性?由之可以进一步思考文、史文辞风格的相关问题。《宋书》还是中古汉语书面语的典范,通过考察其使用习惯、语境来理解词义,并与其他史著语词比较,有助于更具体地认识《宋书》文辞的艺术特征、叙事表现力。二是叙事艺术。如所谓“带叙”法,具体表现如何,怎样增强叙事功能,与前辈史书“互见”法有何区别,对后代史著乃至小说的叙事技巧有何影响等;此外,《宋书》还有虚实、旁衬、伏应等叙述手法,有待提炼;再如《宋书》如何处理载文与叙事的关系,记人叙事中的细节、场景的描写,直叙、转叙等视角、笔法的把握,直笔、曲笔的运用等,皆为本书研究内容。三是情感性。既包括褒贬的价值取向,也包括史家主观撰述情感。《宋书》列传时见情感表露,而序论情感色彩更加突出,如《索虏传》的“史臣曰”,《良吏传序》等,笔挟深情,皆具文学性征。四是故事性。郝懿行曾谓《宋书》“喜谈搜琐,摭摭隐怪,时同小说家言”(《晋宋书故·宋书传》)。除正传中时见小说家言,他如《符瑞》《五行》二志,传奇志异,亟待从文学角度细

① 章学诚《章氏遗书·文史通义·外篇二·读史通》,影印版《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

② 《宋书》卷一百《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68页。

加考究。本书将结合其他史著及杂传、小说,探讨《宋书》故事性之渊源影响,及其所达到的艺术水准。在揭示《宋书》文学性特征的过程中,本书将具体分析其于史著之功过得失,进而结合古人著史实践、史学理论辨析文、史关系问题。

其二,《宋书》文学文献研究。对于中古文学研究而言,《宋书》具有重要的文学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所立文人传记。《宋书》虽无文苑传名目,但著名文人如陶渊明、鲍照、谢庄、傅亮等尽皆有传,而颜延之、谢灵运更是独得一卷篇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以此谓“沈约重文人”,在正史著述中最为突出。这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当然是提供了极其重要与丰富的史料。二是所载刘宋文学现象。如帝王宗室对文士的招纳,文学集团活动,文人间的交游赏会等。文学史不仅仅只是现成的作品史,文学活动、文人交往既是文学史的重要背景,又是构成文学史的动因与缘由,其本身也应该就是文学史的内容之一。三是所录刘宋诗文。赵翼虽曾指责《宋书》“凡诏诰、符檄、章表,悉载全文”,然其却给我们提供了刘宋文学大量原始文献。如《王微传》载王微祭王僧虔文,情深意挚,足可比肩《祭十二郎文》,但《文选》《文苑英华》均未收录;再如《乐志》,既载“汉世街陌谣讴”,又载“江南吴歌杂曲”,是研究汉魏六朝乐府的基础文献。这些文献资料,对于今天认识刘宋文学,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本书将全面清理《宋书》文学史料,重绘刘宋文学谱系,并揭示其于乐府文学研究之价值。

此外,《宋书》在文学批评方面 also 具有重要意义。《宋书》的文学批评价值,除声律论、文笔说等热点外,他如《范晔传》所收《与诸甥侄书》和《王微传》所收《与从弟僧绰书》中涉及的文学观,《裴松之传》相关碑文写作理论;再如《刘义庆传附鲍照传》《袁淑传》《徐湛之传》等对传主的评价,以及诸列传对传主作品的筛选、载录及删裁,等等,其中所体现出的文学批评思想,都有待深入研究。《宋书》还对后世文学批评产生重要影响,林田慎之助就认为《谢灵运传论》是促成刘勰、萧子显、钟嵘等建立齐梁文学史观构架的关键(《中国中世文学批评史》)。《宋书》对刘宋文学家的评论,往往皆成定论。如《文选》对颜延之、谢灵运、鲍照、谢惠连、陶渊明等的介绍,基本皆是《宋书》的浓缩;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论刘宋作家、吴兆宜笺《玉台新咏》,也多取《宋书》意见。本书将系统清理这类文论资源,从作家论、作品论、美学观、文学史观等方面考察《宋书》的文学批评价值。



总之,《宋书》的文学研究,将以文学史的坐标系,来安放与衡量《宋书》于文学之价值。横轴为《宋书》自身的文学、文论成就,纵轴为《宋书》在史著文学系统及批评史、文学史、文学史学史之价值,纵横之间,刘宋文学图景、南朝文艺思潮、文史互动关联,则显溢可见。质言之,本书既以《宋书》为文学文本,又以之为文学史料,含涉史著文学、文学史、文学史学、文学批评诸方面,希望能以《宋书》为样本解读文、史关系,探索正史的文学性征及文学资源。